 北京电影学院教学参考丛书


电影创作及理论译丛

# 理论与批评： 电影的类型研究

王志敏 陈晓云 主编

北京影视艺术研究基地资助项目

---

 北京电影学院教学参考丛书

电影创作及理论译丛

---

# 理论与批评： 电影的类型研究

---

王志敏 陈晓云 主编

---

 中国电影出版社

---

2007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与批评:电影的类型研究 / 王志敏,陈晓云主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  
(电影创作及理论译丛)  
ISBN 978-7-106-02752-0

I. 理… II. ①王…②陈… III. 电影—类型—研究  
IV. J9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4167 号

## 理论与批评:电影的类型研究

王志敏 陈晓云 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665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邮购部)  
E-mail: cfpw@edude.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00 毫米 1/16  
印张/19.25 插页/2 字数/323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7-106-02752-0/J·0980  
定 价 42.00 元

# 目 录

## 一 电影类型：纪录电影与新纪录电影 1

- 尤里斯·伊文思或一种目光记忆 3
- 天外来客——论《时间简史》和《奇怪的收缩人》中的科学幻想 44
- 没有记忆的镜子——真实、历史与新纪录电影 56
- 音乐的电影与电影的音乐——阿伦·米勒访谈 75
- 实体的胜利——高弗莱·雷吉奥访谈录 85

## 二 类型电影：喜剧电影及其他 97

- 喜剧的定义、类型和形式 99
- 喜剧电影和叙事 110
- 噱头、笑话、俏皮话及喜剧事件 121
- 笑、幽默和滑稽 135
- 明星喜剧的文化功能 150
- 青春喜剧片 168
- 喜剧编导分析之一——梅尔·布鲁克斯 174
- 喜剧编导分析之二——伍迪·艾伦 192
- 西部片 273
- 影像中的历史/语词中的历史  
——反思历史真正进入电影的可能性 282



### 三 类型转换：从小说到电影

295

现代小说改编电影

297

理论与批评：电影的类型研究

一 电影类型：纪录电影与新纪录电影





# 尤里斯·伊文思或一种目光记忆

## 1. 前 言

在叙述我的生活，把它分章分节地组织成文之前，我很难不追述一下已经写出的有关我的书籍。它们都在这儿，在我的手边和眼皮底下。对于一个将真理的信念铭记于心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信念铭记于心，即渴望知道这一固有的、折磨人心的、苛刻的真理是否已经得到明白无误的阐述和领会的人来说，这些书籍引发了正反两重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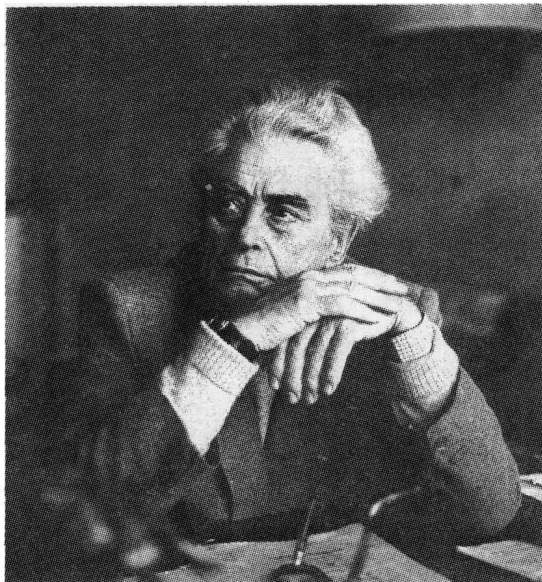
它们首先是令人欣慰的，我一概受领。在我的桌上，从我多年前写的第一部《摄影机和我》到最近巴黎出版的克莱尔·德瓦略所著的最后一部，全世界出版的著作共有十多部。书架上还摆放着一些经过潜心研讨而写就的论文和专著，有托马斯·H. R. 沃赫撰写的，有约瓦大学出版的，还有巴西大学谢尔乔·丹德雷完成的，他通过尤里斯·伊文思的作品来论述电影和Historical的关系。我一直没有勇气把它们全部读完。

最后，在阿姆斯特丹的电影资料馆里，还有一批资料汇集了扬德瓦尔和他的夫人迪内克50年来收集的报刊文章、评论、手稿和信函。总之，有关我的文章、书籍、专论林林总总，足够人们翻阅的。

尽管如此，在我所能获取的满足之外，在一个自感被人承认、受到重视的80岁老人的满足之外，我依然觉得所有这些著作只不过使人看到了我生平的一个侧面。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它们仅从一个单一的、永不变更的角度，即从电影和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我的生活和工作。

今天，我感到转向生平中那个不为人知的或少为人知的侧面或许是有用的，它能充实、纠正甚至修改这些分析。因为这些书，无论是攻击我的，维护我的，否认我的，还是承认我的，都来源于单一明显的事实：我坚持以我的职业干





尤里斯·伊文思

预社会。说到底，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绘制了一幅我并不十分满意的传奇画像。当然，那也是我，我不打算遗忘这个明显事实，但是我仍然期望另做阐述，改造这一素材，揭示其微妙，填补其空白。

因为人们可以用两种方法看待我的生平。既可立足于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看到一个投身于革命运动并为那些为他们的尊严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服务的电影家和社会活动家。也可将其视为一部小说，一部留给年轻人的小说。那便

成了一个荷兰青年弃离家园，带着他的摄影机去发现世界的历险故事。对我说来，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年轻的伊文思的历险故事，被一个热情的和甘为了一项事业效劳的电影家所从事的干预社会的活动所取代。从热情中可以见到他的友谊，他的爱情，他的憧憬和他的幻灭，从行动中可以见到他的影片，他的信念，他的坚信和他的怀疑，两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认为，这才是我生平的真正范畴。是我今天要写下来的，并且要让一切探询人世，反省人类活动的意义与荒谬，渴求获知自己是沉默还是呐喊，是行动还是躲避，是挺身而出还是忍气吞声的人们都读到。

我的生平可能是个典范，倒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典范性，却恰巧因为它是一连串平凡和特殊时刻的交替。在这一交替中，这个人用他的思想、选择、行为、审慎、沉默、希望造就着自我……

的确，我所度过的生活，所做的工作与历史紧密相连。从1930年初起，我参加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我属于那些与反法西斯主义斗争休戚相关的一代人，而反法西斯主义又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对我们这些与20世纪一同出生的人来说，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个巨大的希望，列宁是个伟人。可历史是无情的。这个我们曾经强烈希望看到实现国家消亡的国家又走了回头路。人们的确可以质问为什么我以前欠缺明智，欠缺批评精神。这是一个使我关注的重



要问题。我希望在这篇记述中解答它。

再者，难道我今天更明智了吗？真的具有批评精神了吗？未必如此。我只是想现在我可以以一种不同的观点看待“事物”，而且我感到在避免掩饰局限与缺陷的同时，把这一观点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是很重要的。我意识到一部分人只会从中挑出不足，而另一部分人只会从中找到偏激。各有所求，悉听尊便吧！而我期望在这些吹毛求疵者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人能够从中找到哪怕一段细节，一个字，一处影射，一刻沉默，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怀着信仰去行动，去奋争，并且仍然希望不已的。

这就是我所走过的路。

最后，我想就荷兰佬说几句话。在我们家乡，荷兰佬既不是乞丐，也不是流浪汉，他们是最早的游击队员。在吉约姆多兰士抗击菲利浦二世的时代，他们用游击战抵御西班牙人的入侵。曾经有过两类荷兰佬：水佬和土佬。他们都像狐狸一样机敏，与人民十分接近，难以搜捕；夜晚，他们之间模仿蛙鸣声来彼此联络。当战争结束后，他们仍旧如此生活。有些人当了海盗……永远过着游击生活。直到80岁的今天，我在荷兰人眼里一直是这样一种人。

## 2. 北京,1979年

1978年10月我在北京。一天晚上，几个中国朋友来看我并对我说：“尤里斯，下个月是你的生日，你八十大寿，我们希望你同我们一起来庆祝它。”

这一请求既是出于真诚友好的表示，也是国家机构有意赞许我40年来与其风雨同舟的官方举动。我清楚这一点，可我无法接受，我对他们说：“不，这不行。阿姆斯特丹电影资料馆今年举办有关我生平和作品的回顾展，我已答应他们了。”

我的朋友们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们说：“那么你得答应明年八十一寿辰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和你一同来庆祝它。”

我不很喜欢这类活动。从我幼年时代起，古老的家族习惯就告诉我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学会了把节日与生日抛至脑后。可这一天我很难拒绝。况且我也不情愿那样做，于是我接受了邀请。

次年，我几乎在同期又到了北京，老朋友旧话重提：“好吧，尤里斯，你打算怎么办？”他们问我。

“噢！那么……”

我身处窘境，在中国万事皆微妙，我们却往往难以体会语言中的细微区



别。我回答他们说：“我的生日是 18 号，就在 17 号晚饭前后搞点什么吧。”

“好，晚饭前比较好，我们知道你不愿意晚睡。”

“好吧，”我说，“但要从简。”

“当然。尤里斯。”

17 日晚，当我和玛斯琳来到北京饭店大厅时，有人领我们走向 1949 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全体党的领导人举办庆祝解放的盛大宴会的大厅，一时间，我觉得出了错，可是还未及发问，我们便置身其中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容，都是中国的朋友。这是一个使我感到突如其来的激动人心的时刻：中国人把 40 多年来和我工作过的男男女女都召集来，济济一堂。自 1938 年以来的往事历历浮现在眼前，我无比激动。

我与中国的交往远非是简单的政治交往。这个国家教会我的东西太多了：一种处世方法，一种对生活所持的态度。近年来我感受到了两种交往差别的分量。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我既非汉学家，又非专家，也非来华三四十年的外籍人。我既与埃德加·斯诺不同，又与共产党人不同，我深信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人有像我这样同中国的关系。它在双重意义上说来都是事实，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这同样是破除常规的事情。他们收养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人。

我的中国朋友们以他们天生的追求热烈与庄重并举的平衡感打动了我。我再度思考筹划这一晚宴对他们和对我来的含义。它确是官样十足的客套举动。可与此同时，在无数的细节上，我都感受到了那动人心弦的无微不至的关注。这就是中国，是我从结识之日起便热爱的中国。

宴会开始，各个团体的代表们便前来为我祝寿。每次我都要起身相迎并致答词。那是相当滑稽的：一个 80 岁的白发老人，此次宴会的主宾，为了与人们握手，只好不停地起来坐下……

但又是激动人心的。站在我面前的人是前来为老战友致意的。这些男女们清楚，从那飘忽未定的时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一直与他们站在一起。我被这如此精心的中国式款待、被这声势所打动。我对自己说此次晚宴是一种举动，是一种以求进一步的联系和对我的选择的宽慰方法。这些人中很多人被流放过或坐过监狱。可他们都在这儿，身心自由。把我与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条强大的纽带，它是无法估量的。

我想往远处走走，可周恩来夫人坐在我旁边。周围都是桌子，每隔五分钟我就要举杯起身。拍摄《愚公移山》期间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走来了：两年来的共同生活，载着这一庞大事业中的失误、斗争和喜悦。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



演员代表们和在延安艰苦年代中扛过我交给周恩来的摄影机的摄影师代表们从另一个桌边走来。我的导演和编剧朋友们，我授过课的大学的学生们，纪录片厂的和北京、上海、广东的电影工作者们也走过来了。走上前来的还有我的欧洲、美国和印尼朋友们。

气氛逐渐轻松起来。中国人讲迷信，注重符号和它们之间的配合。他们拿数字出来大做文章（在中国九是神圣的数字），他们提示我八十一是双九相乘的产物。纪录片厂的代表们告诉我他们的制片厂叫八一厂，在中国简写为八和一。他们对此类关联十分自豪。时而有人流下眼泪，这是可以理解的。玛斯琳对这些友好举动也深感激动。她是怀着某种担心开始这一新的旅行的。她曾寻思我们将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将处于何种境况，但这天晚上，她被这礼遇所打动，又获得了已被她忘却的友谊的温暖。

在晚宴进行中我对周恩来夫人说：“您不必因为我强留在此，我知道此类礼仪劳顿身心，您当珍重自己。”“不，”她对我说，“离开是万万不能的。我丈夫与您一直在一起，如果他还在，他也要留在此处的。我替他留在这儿。”

我没坚持己见。她的回答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情谊，它起始于1938年，那时我拍摄了第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四万万人民》。以后，周恩来总是帮助和支持我。

我也记得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时刻。那是1930年，我第一次在苏联逗留。我已记不清那是一次什么活动。我们来到列宁墓，它是一座十分简陋的木台，自然是斯大林主持这次活动。群众和工人、部队的代表们从木台前走过。他们之中有老革命家，有穿皮衣、挎长枪的1917年的老战士。队伍中有人用手势向斯大林致意，斯大林竟认出他来：“哎，伊万！谢尔盖！”老战士后面是工人，然后是集体农庄代表。大家都仰望着斯大林。队伍中走出一些手持标杆的男女，标杆顶端都插着一颗大菜花，他们走过观礼台，在斯大林鼻子底下摇动菜花。斯大林笑着说：“好大的菜花，请往前走，同志们！”

我是前来拍电影的荷兰青年，可我却没能拍下这一时刻，胶片已经用完了。但我是这一领袖与群众直接接触的见证人。这种接触后来再也看不见了。他们之间掘开了一条鸿沟，人民群众先是被隔绝在50米之外的地方，后来变成了100米以外的地方；先是由警察警戒，后来就成了由军队警戒，红场上再也看不到菜花了。可当年确实有过这种直接的接触。莫非那是演戏？我不信。我相信那些人的自发感和自豪感，并分享了他们的欢乐。

我还要回到我在苏联的年代。这里的回顾不过是像一处路标，它确定了我的观念范畴。1930年在古朴的列宁墓前，此一程也。1980年在毛泽东纪念



堂前，彼一程也。我在这两点之间，在历史中穿行往返：荷兰、比利时、美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古巴、智利、越南和一切反抗凄惨、邪恶及奴役的人们所在的地方。共产主义是这场战斗的先锋队，我拍摄共产主义。昨天在苏联，今天在中国，如果体力允许，明天再到别的地方。

我说这些话并不只是为了教诲西方青年，也是说给我的中国朋友和同志们听的。他们在我看来往往比 20 来岁的法国青年更珍贵。而且我也期望这些青年把握住一个有我这样经历，有我这般生活的人的形象或影像。最重要的是弄清在我生平的某些时刻，我是如何克服所遇到的困难的。靠理想主义还是靠机会主义？靠执着己见还是靠自我牺牲？以及我是如何检验并遵循理智的。我知道这是个很大的字眼，但我找不到其他的字来说明是我的理智构建了我的生平。每次要拍片时我躬省自问，每次我的理智回答我是或非。我就这样向前行，选择了方向，促动了工作、友谊、对女人的爱和幸福。

我做此强调，是为了充分表明我不是一个封闭在一种制度下的共产党人或革命家。我对那些前来拜访的年轻人常常说：“我想将你们尽可能地引向远方，直到你们能理解我的疑虑与信念，并且要你们懂得，对我来说带着重重疑虑是走不远的。”

我生活在我的信念中。它们在众多的时刻建筑在仅属我个人而非他人所有的直觉和情感上，假使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今天同意到佛罗伦萨拍电影时，我无法做出明晰的回答。当然我受到了恭维，他们请我去拍片，如同佛罗伦萨鼎盛时期那些著名画家被召唤去作画一样，历史的重演使我备受鼓舞，此举确实非同小可。但是其他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我同意的话，我将怎么办呢？拍中国的影片怎么办？拍飞翔的荷兰人影片又怎么办？我是否要把这些计划都弃置一旁呢？

究竟如何是好，我并不十分清楚，况且这也不重要，这体现了我不自信的一面。我同意去佛罗伦萨拍片是出于某些个人缘由，这又是我自信的一面。从 1951 年我第一次到那儿去，便与这座城市结下良缘。在那里我有一些朋友，我认识佛罗伦萨的艺术家、大学生、老社会活动家和住在宫殿里的贵族。我与该城有过对话。当我站在博物馆中，面对贝里尼或达·芬奇画像时，我不仅看到了一部艺术作品而且看到了本人，我试图同他用语言交流，试图找到他的成功与失误，这是首要的东西。我应当同这些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过的画家建立联系。我们同归一个家庭，同处一种地位，连提出的问题都相同：“他给城市贡献了什么？城市从他那里领受了什么？”

从另外的方面来说，佛罗伦萨又是一连串机遇的结果：如果没有我 50 年



电影展,如果没有市长的邀请,也就不会有佛罗伦萨计划。我的生活总是如此,它是一连串的机遇。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在佛罗伦萨拍片,突然,它成了我现在要拍的影片,对另一个人说来,这可能是一本要写的书,或是一幅要作的画,或者广义地说是选择一个新的方向。而对我说来,它是关于这个城市及其文化历史的一部影片。是一部关于今日意大利的影片。它并不是命运的挑战而是机遇的显示。我的生活常与机遇相随,我的生活并不是维系在排斥机遇的理性上。有时,人们在谈论我时会说:“机遇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他并非真心希望的东西。”何等荒谬!我拥抱机遇,从一开始它就是我的同途伴侣。

.....

### 3. 1938年,汉口

1938年1月21日下午4点钟,我坐上了“旧金山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驳船号”飞机。这架设备简陋的水上飞机在太平洋岛上逢站便停,终将美洲与亚洲连在一起。本应在四五天内到达香港,但实际上我们飞行了18天。我不愿意错过这次真正的疯狂冒险。飞机这个与20世纪一起诞生的发明物,从来都吸引着我,它是我孩提时代的梦想。

在尼麦格市贝申斯恰特我家的房后有个很小的花园,它夹在木凉台与公园后墙之间,这便是我游戏和想象的窄小天地:海员、海盗、印第安人,花样层出不穷。直到有一天航空先驱们的故事把我那些头插羽毛的武士们全部打垮。路易·布雷里奥、莱特兄弟和他们的机器取代了一切,他们成了我的崇拜对象。我那时10岁,对航空的迷恋,使我热衷于做个手艺人。我模仿这些神气的机器的样子,用自己的手造了架“飞机”。它足有3米长,虽说飞不起来,却也无妨,因为由我来替它飞。一只我父亲旅行用的大木箱构成它的机身。旧木块、破单子、纸箱子、图钉、绳子、钉子构成了其余部分。引擎是硬纸壳的,还有个轱辘当滑轮,我可以钻入掩体,通过绳子和滑轮操纵舵杆和其他设备。

它还真像那么回事儿。我一个人坐入机舱中,面对驾驶台。穿着又厚又热的衣服,戴着风镜和耳机,忘记了时间,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周游世界。午饭时母亲问我:“你跑到哪去了?”

“噢,我在飞机里。”

“这么半天!你究竟在那里干什么?”

“旅行,我到了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真是想入非非!”



我在飞机中遐想，随兴趣到世界各地旅行。在我的头脑中，大地并非是个会自转的地球，而是像终年挂在教室墙上的地图一样扁平，有着单一的颜色。在这孤独的游戏里，想象代替了汽油。那是我渴望认识世界的具体表现。获得这一启示是几年前的事了。有一个星期天，在午饭后我父亲起身宣布：“今天下午我们到圣安娜去，带孩子们也去。”

圣安娜是尼麦格郊区的一个市镇，到那儿去要坐一段马车，还要步行 30 分钟。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13 岁的威姆和 8 岁的我，看到墙上张贴了多日的招贴画：比利时公民奥列斯拉杰先生将在比空气重的机器中飞行。这个“比空气重”把我们吸引住了！那时气球已被人们使用，屡见不鲜，而这个“比空气重”却显示出一种对自然和上帝的挑战。

这一天，尼麦格市所有带好奇心和怀疑心的人以及爱好科学的人都来到圣安娜镇。好几百人在铁丝网外看着这个人，他同招贴画上的人一样，戴着圆眼镜，帽子倒扣在头上，随时准备乘机起飞。他低着头，走在地面铺好的木板上，时不时停下来，用脚踩睬不听话的板子。他的助手们都在周围望着他。这使我想起了走钢丝演员上场前的准备工作。滑板的另一端停着一架飞机，是一架单引擎飞机。比利时人钻进去准备起飞。他打了个手势，助手们便发动引擎：一次，两次，三次，马达喘息着，走走停停，不肯顺从。助手们再度发动引擎，这时人声哗然，我们周围的议论变得刻薄起来：“它怎么会飞起来？明摆着的是开玩笑！……”突然，螺旋桨转动了，比利时人又做了个手势，助手们撤除了路障，飞机开始在木板上滑动。人群寂然。以后发生的事全在一瞬间，奥列斯拉杰的单座机滑动至百米开外时突然挣脱引力，机轮离开了地面。机身真的在我们眼前腾飞了。它不断上升，飞行几百米后驾驶员猛然转弯下降，在田地的另一端着陆。人们鼓起掌来，冲过铁丝网跑向比利时人和他的飞机。这就是我同飞机的第一次接触，它深深地震动了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曾当过炮兵中尉，那时我 18 岁，毛遂自荐要做航空观察员。驾驶员坐在前面，我戴着望远镜坐在后面。天空在我脚下，无遮无挡。风迎面扑来，大地在变换。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乘坐飞机，我喜欢这个时刻。我和杰尔曼绝交时她正在巴黎，我从阿姆斯特丹乘坐飞往巴黎的飞机，途经布鲁塞尔。那时已有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朋友们都说我疯了。

不久，在拍《南海》时，飞机出了事故，我差点儿送了命。当时我在拍摄一个大坝。使用的是军队的双座机。我把射击台进行了改装，安放了摄影机。这飞机也是一架培训飞行员的教练机，设有两个操纵台。这天下午，天空晴，我们预先调整好飞行操纵台，飞了两圈。突然，飞机直朝地面扎去。正对着下



面的村庄。事态千钧一发，我前面的驾驶员中了魔似的又喊又跳，他转过身来，满面涨红，对我吼叫不停。可马达的轰鸣声淹没了一切，我们直向教堂钟楼坠去。100米，只有80米了……飞行员继续向我做出绝望的手势。怎么办？跳下去还是祈祷？飞机像散了架，我实实在在地想到我们完了。突然，我脑中一闪念：是操纵台出了故障！我低头一看：装摄影机的袋子滑到了操纵杆上，致使操纵台完全失灵了。在这危急关头我清醒了，此时飞机距房屋仅有20米！我头一次感到坐飞机的可怕。

我已八十高寿，终期可待，近来急于尝尝坐协和式飞机的滋味。我从未丢弃飞行的欲望，总是迷恋着乘坐飞机；在云雾中穿行，观看，遐想……我可以一连几小时毫无倦意地乘坐飞机，在飞行中旅行，走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1938年时我还没这么浪漫，那时的想法更现实些。乘坐泛美公司“中国驳船号”可使我一举两得：成为第一批从空中穿越太平洋的人和以破纪录的速度到达香港。不幸的是飞机一开始便出了故障，在从旧金山飞往檀香山的路上，机组人员不顾旅客冷暖，掀掉了机身的护层，结果可想而知：油压不断下降，他们到处寻找漏油口，然后用麻布来堵，我们被迫返航旧金山。此次旅行实属罕见，冰冷的气流吹进机身。透过地板缝，我看到3000米下的太平洋在月光下粼粼放光。

第二周的星期一我们又从旧金山出发，这次顺利到达了檀香山，经过一天休整，我们离开檀香山前往密德卫群岛，半路上，新的技术事故再度迫使我们的“中国驳船号”返航。1月28日星期五，在我们离开旧金山一周后，由于天气恶劣，我们依然停留在檀香山。

前后矛盾的、使人紧张的消息在旅客中传起来：人们害怕日本人，害怕坏天气，害怕撞飞机……人们开始怀疑“中国驳船号”的性能。漏油事件不是令人忧心忡忡吗？我们登机前装在飞机上的邮包早已坠入太平洋中，大海里只留下一湾汽油，此事确凿无疑。最后，我们的“中国驳船号”被“海湾驳船号”取代。2月3日星期四，我们离开檀香山飞往密德卫群岛。此后旅途顺利；从威克岛到关岛，从关岛到马尼拉，从马尼拉到香港，抵达日期是2月8日。横渡太平洋比预计的时间多用了整整13天。

这次旅行至今还给我留有一种奇怪的感情，在檀香山我第一次接触到殖民主义式的异乡情调，并为之震动。这是何种异乡情调啊！它是最虚假、最乏味的。檀香山是太平洋上亿万富翁的天堂，它的豪华已与时代格格不入，它的惨状却被几乎平庸的风光与太阳镀为金色，那情调是奇特的。旅客被一种扰人的紧张感笼罩；是初次起飞的危险还是担心遇到日本人造成的呢？途中每





每遇到船只,无线电便发报联络,对方如不回答就可能是日本军舰。那时,副驾驶员就在航行日志上写上:“不明身份的舰只。”出发前,公司没收了我的摄影机和镜头,还用漆把它们封起来。我觉得好像到了远离美国的极地,或是来到另一座地球上。可我却是在飞往远东的途中。

我期待在香港发现中国,可我看到的却是大不列颠式的刻板、资本主义的狂妄和中国式的贫穷。香港不能代表中国,它好比正餐前的一道冷盘。所不同的是这里有许多中国人,气候更温暖。我觉得自己只身来到他乡异国,既不吃惊,也不失望。香港是一站,这里英国人到处都是,他们统治着全城,你往往躲之不及。要想避开他们,得叫辆出租汽车到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去。

再走过去便是中国。辽阔神秘的中国。这是一块陌生的大地,我只知道它的三分之一国土被日本人占领。北京、上海、南京失陷,战事不断。这是我遇到的第二次战争,可这一次我却没带着纽约朋友的剧本,我徒手而至,自感已投身于一场规模难测的历险。当我登上亚洲大陆时,弄明白中国政局成为了最复杂的事情。这里好像有双重政权:一方面是由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国民党,另一方面是由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他们之间虽有协议,可是大家都说协议是一纸空文,形同虚设。1935年长征后,谁也说不清共产党的实力及弱点所在。人们只是说共产党人吃苦耐劳,充满信心。

由于我有意拍摄一部反映中国抗战、帮助中国赢得胜利影片,中国之行便像当年西班牙之行一样成为一个政治举动。可我对中国一无所知,同大家一样,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大国,有着自己的文明、文化、历史和象形文字。至于中国的政治生活,我的知识同任何一位进步知识分子的知识所差无几。我读过安德烈·马尔罗所著《人类的命运》和斯诺的书《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仅此而已。

我们在纽约曾组织过一个名叫“当代历史”的协会,协会的朋友们常聚首一处,只有个别人除外。海明威保持着他同协会的距离。有一天,我在旧金山碰到他,他不无嘲讽地对我说:“又要到那边去了?在西班牙之后,第三国际又转向中国了!”

我不想同他争论,海明威有他的信念,我有我的。共产党人和我,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无关紧要。我预想得到5万美元以便来拍片,为了得到它,必须扩大我们的关系网,争取新资助。原籍奥地利的女演员路易丝·海娜组织我与中国的银行家与富商见面。自从她在《好天地》影片里成功扮演了保尔·穆里身边的一个亚洲女子后,便成为旧金山中国领地上的红人。在唐人街的一次晚餐上,我们和一个中国银行家达成了协议。这人既是百万富翁,又